

第一章 权力堡垒：克里姆林宫神秘之谜

俄国生活上下起伏的舒张和收缩 集中在这个石砌的宫墙的乐声里。上升——下降——上升——下降。

——苏联 拉里莎·瓦西里耶娃

如同法国的爱丽舍宫、美国的白宫一样，克里姆林宫是神秘的和权威的，它们不仅仅是国家政治和权力的中心，而且往往还是这个国家的象征。

从遥远的 12 世纪 直至 21 世纪的今天，800 余年过去了。在世事交替、风云变幻的漫漫历史长河中，克里姆林宫的主人们或已功成名就、或已遗臭万年、或已湮没无闻了，但克里姆林宫的红墙、钟楼却依然矗立，它们是俄国上层政治斗争的见证者。透过如烟的帷幕，我们依稀看到了那陈年的往事。

一代代帝王将相，一代代人杰奸雄。他们的兴盛与衰落，他们的成功与失败，他们的喜怒与哀乐，他们的际遇与命运，他们在克里姆林宫里的所作所为，构成了一部鲜活的通俗俄国史。

一、双城记 莫斯科——彼得堡

俄罗斯的先民们走出森林，走向东欧平原时，他们发现自己面临的不仅仅是荒野上狼虫虎豹的袭扰，而且要防备身边强悍的异民族的入侵。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妻女，他们被迫要使自己武装起来，而且还要建筑易守能攻的堡垒。这些堡垒一般都建筑在河边或者湖边的山丘上，城堡四周建有防卫的城墙，城墙上高高的塔楼。城堡的外面，手艺人、小商小贩渐渐增多，出现了大的集贸市场，出现了大片的民房，这里就成了一座新城市的中

心，这样的城堡就叫克里姆林（Кремль）。在俄罗斯的许多古城市，克里姆林宫作为城市统治和防卫中心的实际功能和意义已经丧失，但它们处在城市中心的位置却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在俄罗斯，旅行者在询问如何去市中心时，得到的回答往往都是：“往前走，就在克里姆林宫的旁边。”因此，克里姆林宫，不是莫斯科的专利，它遍及俄国各地，它的俄文原意是山上的城堡。但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则是俄罗斯现存最大的宫殿。

俄罗斯的建筑艺术在 16 世纪时，逐渐具有了独特鲜明的民族风格。克里姆林宫位于莫斯科中心，并不断向四周扩建，形成一个宏伟的建筑群。靠近宫殿外围的建筑有仓库、地窖、粮仓及马厩等杂屋。离皇宫不远，伊万诺夫广场的对面，是政府各部、署所在地的石头大建筑，沙皇和领主的各种命令，就在这座大建筑的台阶上向群集的人们宣布。领主、僧侣和某些巨商的住宅也在克里姆林宫里。从 1485 年起，克里姆林宫围墙进行改建，克里姆林宫内的圣母升天大教堂是经过意大利建筑师阿里斯托捷尔·费奥拉凡京设计建筑的。莫斯科是沿克里姆林宫向四周发展的，随着莫斯科的发展，围绕莫斯科诸侯、领主们的庄园，周围有住有手工业者奴隶的村庄和大村，后逐渐并入城市。城市境内昔日的牧场及村落名称，长久地保存在莫斯科的街道和广场的名称里，库得林诺广场所在地，就是从前的库得林诺村，波良卡所在的地方从前就是一片翠绿的田野（“波良卡”是俄语 Поле 田野）的音译）。克里姆林宫的红场是 15 世纪末，在被火烧光了的地方形成起来的。因此，它很久还被称为“火烧广场”。在这个广场上进行集市贸易活动，也执行各种刑罚。从 17 世纪中叶起这个广场才称为红场，大概因为它在当时是莫斯科最大最漂亮的广场，在俄语“红色的”（Красный）和“漂亮的”（Красивый）词根相近。

当时的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已经粗具规模，在筑有雉堞的宫

里面，是教堂、王公官邸和皇宫。阳光照射下，教堂的葱形镏金穹顶金光灿烂。意大利能工巧匠装饰的殿宇巧夺天工。宫墙的四周，是许多木结构的房屋、葱郁的花园和宽阔的街道，但一下暴雨这些街道就变成一片泥沼。工匠们的破作坊与贵族的富丽府邸为邻，蒸汽浴室旁边是法力无边的小教堂。所有的俄国人不分贫富，每周都要到蒸汽浴室里洗一次蒸汽浴。在克里姆林宫广场上的棚铺和摊店之间，是喧闹的、五光十色的集市。卖艺的、耍狗熊的和行吟盲者吸引着赶集的人，而赶集者又吸引着小偷扒手。在卖油煎薄饼“勃里尼”和“格瓦斯”饮料的小摊旁拥挤着的人最多。在克里姆林宫广场的高台上，官员们当场宣读沙皇的诏书或政府的命令。

到了夜晚，通往克里姆林宫的条条道路都是戒备森严，道路上摆着拒马，宫墙上架着火炮。为了宫内沙皇和大臣们的安全，这里有许多卫士守卫着。“杜马”即贵族会议，也在宫内举行。在拱顶粗柱低矮的皇宫内，主要的色调是金红两色。教堂里到处悬挂的圣像都是金色的。寝宫和觐见殿、贵族的服装，无休止宴会上使用的盘盏也都是金色的。

外国旅行者在游记中描述：“大部分房子是新的，用砖头砌成。我们为它的美丽装饰、坚固以及建筑技巧而感到惊奇。对美丽的四边带雕花的窗子和柱子，它们像一座座小碉堡，令人赞叹不已。还有一些巨型的五颜六色的大理石堆砌的建筑和种种精细雕刻的艺术之作……”更有的西方游客感叹说：“俄罗斯人在建筑艺术领域的成就，甚至可以得出结论，俄罗斯国家简直是一个建筑师的国家……”

1672年，在克里姆林宫上演了俄国历史上的第一部话剧，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亲自前来观看，随后又上演了反映《圣经》故事以及某些历史事件和人物为题材的戏剧。从某种意义上说，克里姆林宫就是一个教堂群。这里有圣母升天大教堂，俄国历

史上每一个皇太子降生后，都先由这个教堂敲响大钟，将好消息通报全城和全国。圣母升天大教堂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历代皇位继承人的婚娶和登极大典都要移到这里举行。此外，还有报喜教堂、大天使教堂。它们都是 15 至 16 世纪的建筑，融合了古代拜占庭、罗斯、巴洛克以及希腊罗马的建筑风格，极其辉煌壮观。从报喜教堂和大天使教堂之间的空旷处极目远望就是“伊凡雷帝”钟楼，这个钟楼以其高险而著称。

穿过教堂群，迎面而来的是亚历山大花园，再往前走，就可以目睹“钟王”和“炮王”。“钟王”是俄国历史上所铸造的最大的钟。钟高 6.14 米，直径达 6 米，重达 200 吨。“炮王”重 40 吨，长 5.34 米，炮口直径达 890 毫米，它完全可以容纳下一个成人的身体。彼得一世执政后，进行了俄国历史从未有过的重大改革。法国传记作家亨利·特罗亚评价：“彼得非常痛恨莫斯科这个历代沙皇久居的城市。他痛恨那里的大陆性气候，那里的传统的古风旧习和当地人的各种迷信行为。他痛恨在那里施展的宫廷阴谋以及人们的落后的、东方式的，然而又同时带有叛逆性的精神状态。在他看来，莫斯科意味着索菲娅公主，象征着射击军以及他们令人难忍的狂妄自大。如果他要使祖国迎着未来前进，他就必须向大海，向西方‘开窗’。因此圣彼得堡这个从无到有、强行修建和靠专断力量发展起来的城镇，不仅仅给俄国的地图上增添了一个都会的标记，而且也体现了沙皇拒绝其先祖的遗产、立志革新的心愿。它将使彼得的名字流芳百世，成为他统治的象征。”

1703 年，彼得一世做出了他一生中的一项重大决定，放弃世代莫斯科大公、俄罗斯沙皇驻陞的莫斯科，迁都北方涅瓦河口。

1703 年 5 月 1 日，俄国军队攻克涅瓦河三角洲上的尼尚茨城堡，彼得一世亲率 60 艘战舰由水路发起进攻。6 天之后，两艘增援的瑞典舰船因未得到尼尚茨堡投降的消息而驶进芬兰湾。城防卫队立即根据沙皇彼得一世以及陆军元帅缅希科夫的命令，以小

船与瑞典人的大船进行近战，杀死 58 名敌人的水手，俘虏 19 名，两艘战船自然被俄国俘获。彼得一世在写给别人的信中高兴地说：“我们在海上从未抓获过如此多的船只。在我们的珠宝箱里找不到任何能与之相比的贵重物品的，这件事将是空前绝后的。”

1703 年 5 月 16 日，彼得一世下令在涅瓦河口附近的叶尼·萨利岛上建立彼得—保罗要塞，为自己和亲信建筑了几座木头房子。当时的人们肯定不会想到，彼得一世是在为未来的新的首都奠基。几个月后，在涅瓦河口出现了一艘装满烧酒和盐的荷兰商船，彼得一世非常高兴，他命令奖赏给船长 500 盾，每名水手 30 埃居，以感谢他们在“彼得城堡”的驻留。

从 1703 年下半年开始，新都彼得堡的建筑工程正式开工了。“木匠”彼得亲自参与新都的设计工作，对工程进行监督，他从一个工地跑到另一个工地，手里拿着尽人皆知的粗短木棍，以便用来敲打那些偷懒的人。他和工人打交道时，如同和建筑师打交道一样，不拘礼节。

1706 年，彼得一世下令海军部和陆军部迁到彼得堡，1708 年彼得一世坚持要求自己的妹妹纳塔利娅、两个同父异母的妹妹迁到彼得堡，还专门在这里为她们建了剧院。这仅仅是一个开头，过了不久 350 家贵族被强令迁到彼得堡定居。1713 年，圣彼得堡被定为首都，第二年，新首都的人口达到 34550 人，到 1723 年人口达到 70000 人。

但是不论是被迫迁居这里的人，还是那些自愿迁居到这里的人，无不对这个“水上都市”抱怨不止。他们不习惯这里令人厌恶的环境——冬天的暴风雪，夏天的蚊虫，春季和秋季的洪水。由于交通不畅，使通往新都的供应不能得到保证，这里的生活费用要大大地高于莫斯科。就食品而言，其价格比莫斯科高出二至三倍。

但是一切都在按照彼得一世的计划在发展。彼得堡逐渐地变成俄国新的政治中心、军事中心、经济中心、商业中心和文化中心。

彼得一世为自己的亲信沙菲罗夫、缅希科夫、戈罗万、雅古尔申斯基、杰尔尼切夫、加加林等宫廷显贵在彼得堡修建了比他们在莫斯科更加豪华的府邸。在海军部大楼的前面，斜着有一条笔直宽阔的大街，这就是未来著名的涅瓦林荫大道。每周星期六，由瑞典的俘虏来打扫。大道的两旁，还有其他的王公贵族的宅院。在与涅瓦河平行的另一条大道上，于 1711 年彼得一世下令修建冬宫。当时这座皇家的宫殿并不多么起眼，它几乎被淹没在一片豪华的私人府邸之中。其惟一的区别在于大门是由两根大立柱支撑，上面还悬挂着船头的模型。在这幢简朴的建筑物里，只有一间宽敞的接待厅，其他均是一些窄小的房间，因为彼得一世喜欢小房间。为了与相邻的房子协调一致，有的楼层不得不盖得比较高，彼得一世便命人在他经常使用的房间里，加修一层天花板，使屋顶矮下来。

彼得一世在主持修建位于涅瓦河支流岸边的夏宫时，也表现出同样的风格。后来这条支流被命名为风坦加河。这座夏宫犹如一座荷兰乡村的住房，金属屋顶，淡黄色的墙壁，白色浮雕，它座落在花园的中心，周围有花坛、草坪、人造岩洞、凉亭、喷泉、雕像、游廊，一切的一切都具有凡尔赛宫的特色。再远一点是彼得一世个人的收藏馆，里面收藏了彼得一世从欧洲各国带回来的珍奇物品。

特罗亚写道：“每到星期天，船主们必须去听有关维护和保养船只的必要知识。如果他们因事不能出席，则必须派自己的孩子代替他们听课。天气晴朗时，五颜六色的双桅纵帆船以及由身穿花色上衣的桨手们驾驶的小艇，往来于涅瓦河之上。沙皇也驾驶着自己的船艇游弋，在他的有经验的目光下，那些显贵们实际上在展开一场灿烂的比美竞赛。整个宫廷人员全部扬帆，浩浩荡荡地穿梭在崭新的宫殿、工地、破旧房屋、荒地、木头栅栏和货场的中间。这时从圣彼得—保罗古堡开始鸣放礼炮，专为这一场合组织起来的音乐家们，在船上也演奏起一些欢快的曲调，为那些晕船的贵夫人们消愁解闷。”

“到了冬季，涅瓦河上冻了，原来被分割的城市凝结成一个整体。再也不需要小船或木桥便可以在首都穿行。沙皇居住在圣彼得堡时，每次都要亲自乘雪橇开辟一条雪白的大道，此刻圣彼得—保罗古堡的一声炮响，宣布开道开始，跟在陛下后面是一大批蜂拥的人群，他们都急于步行穿过涅瓦河。其实，彼得一世并不喜欢下雪的季节，这季节是与北海的航行事业为敌的。”

对于彼得一世来说，每年的开春季节是令他欢快的喜事。河水解冻后，他又可以周游他的“天堂”了，而且没过多久，他的天堂越过圣彼得堡，已经到达了海湾的南岸——在那里，彼得一世和他的亲信们修建了自己的别墅：斯特列纳亚别墅、奥拉尼安堡别墅、彼得高夫别墅……彼得高夫成了沙皇平时度假的地方。那里有一个法国式的大花园，可以看到海湾的海水。根据勒布隆的设计方案，修建了两层楼高的大型宫殿，内部房间仍然很小，布置得优雅大方。每一个工作间里都配有大书柜。尽管这些房子很讨人喜欢，可是沙皇却宁愿住在一幢荷兰式的普通房子里过夜，这所紧靠海边修建起来的房子，被命名为“我的欢乐”。

彼得堡不仅在建城的年龄方面是年轻的，而且在居民人口的组成方面更可以称之为年轻的城市。这里有俄国第一批学校，第一座博物馆和图书馆，第一座剧院，第一所公共医院，第一个公园。彼得堡内有大量的军队，而且还有许多学校，年轻的士兵和学生成为城内第一批居民，因此城内的居民以 40 岁以下的青年人为主。这正合了彼得一世的愿望，他之所以迁都彼得堡，正是为了逃避克里姆林宫占统治地位的、顽固不化的、反动落后的思想情绪。而在彼得堡这座年轻的城市时，他把希望寄托在年轻人的身上了。

彼得一世是乐于助人的君主，他并未因为自己地位至高无上而冷漠处世。他不仅经常微服私访，出现在彼得堡的每个角落，而且是彼得堡救火队的成员。彼得堡的建筑主要由石头和木头建成，每年都要着上几场大火。但一旦火警发生，人们就能看见俄国

的沙皇彼得一世在大火中的英勇行为。法国驻俄大使儒埃尔写道：“我多次看见他第一个来到失火地点，雪橇里带上他的消防水泵。他参加全部的灭火工作。由于他的思想异常敏捷，他能立即判断出应采取什么灭火措施。他爬上房顶，哪里最危险就到哪里去。”

到 1715 年，彼得堡已经发展成为俄国新的政治中心，这里有枢密院下属的各个院以及沙皇办公的宫廷。俄国宫廷的达官显贵们在彼得一世的命令下都将自己的官邸迁到了彼得堡。彼得堡成为新的文化中心，这里建起俄国第一批学校等文化教育设施。

彼得堡成为新的商业中心。它在商业上的周转额超过了俄国北方的旧港阿尔汉格尔斯克好几倍。它重新把波罗的海沿岸的商港维堡、雷维尔、里加联系起来。1724 年驶到彼得堡的外国商船共计 180 艘。

彼得堡成为俄国新兴的工业中心，这里建起第一批大型的工场、兵工厂、造船厂、皮革厂，它的经济地位逐渐取代了莫斯科。

逐渐地，莫斯科和克里姆林宫感到了冷清，昔日车如流、人如潮的情景少见了。但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仍然是俄国沙皇的夏都，历代沙皇的结婚、生子和登基大典都要在克里姆林宫的圣母升天大教堂举行。

可以说，十月革命结束了俄国的封建专制君主制，也正是十月革命使克里姆林宫恢复了自己的荣誉，它重新又成为了俄国独一无二的政治中心。当起义的工人和士兵们占领了莫斯科之后，他们是想把代表俄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克里姆林宫摧毁的。而第一届苏维埃政府中少有的“艺术家”卢那察尔斯基甚至为此准备宣布辞职，以抗议赤卫队的过火行为。他在一篇声明中大声疾呼：“同志们，正在莫斯科发生的事是一场可怕的、无法弥补的灾祸。……人民在其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已经伤毁了我们光荣的首都。……在这些斗争猛烈和战祸惨重的日子里，作为国民教育人民委员，这是特

别可怕的事。……即使最愚昧无知的人也将会醒悟和理解，艺术是快乐、力量和智慧的源泉。”列宁也特别过问了此事，才使克里姆林宫没有遭到太大的破坏。

1917 年的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把首都迁回莫斯科，同时决定将克里姆林宫作为党中央和政府的办公地。莫斯科位于俄罗斯的心脏部分，在避免外敌入侵方面，自然是比彼得堡安全得多。而且，新政权也不想定居在不久前被它们推翻的那些统治者的老巢。为人民而战的斗士们，认为自己吃住在痛恨布尔什维克的人曾骄奢淫逸过的地方是莫大的耻辱。新政权的第一个领袖列宁和他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就长期生活和工作在这里，直至 1923 年他发病后才移居莫斯科郊外的哥尔克村休养。

克里姆林宫的建筑群可分为两大部分，靠莫斯科河的那一边是前面介绍过的教堂群，靠红场的这边是苏联权力机关办公地。斯帕斯克塔楼的后面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办公楼，旁边是苏联部长会议的办公楼。这里面发生的事是苏联的最高机密，这片楼群对于普通百姓和游客是不可逾越的禁区。

1924 年 1 月 27 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红场前增添了一栋新建筑，里面停放的是 6 天前去世的苏联人民伟大的导师列宁的遗体，为的是让无限爱戴他的人民最后瞻仰自己领袖的遗容。1930 年，列宁墓重新建筑，木质的墓基被花岗岩所代替。在克里姆林宫还有一座列宁的坐像，它不同于遍及苏联各地的列宁像，那些列宁像或是昂首阔步，高举手臂，或者一手插在西服口袋里，另一只手前伸。而这个坐姿的列宁像普通极了，完全没有“高”“大”“全”的形象，他更像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学者或教师，在紧张的工作后，忙里偷闲地来到自己家里的后花园，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他面容和蔼看着那些从前自称是他的学生、战友的人在克里姆林宫里演出一幕幕争权夺利的闹剧，看着怀着各种不同心情前来参观他的宫殿的老人、妇女、儿童和外国游客们。

在克里姆林宫和列宁墓之间有一块狭长的地带，这里是列宁的战友们安息地。刻着死者头像的墓碑错落排列，下面埋葬着生前曾经无比显赫的人物。在这里能够找到苏联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斯大林、捷尔任斯基、斯维尔德洛夫、勃列日涅夫……

当飞机飞临莫斯科上空时，远远的就可以看见克里姆林宫 5 个塔楼上闪闪发光的红星。这 5 颗功率均在 5000 瓦左右的巨大的红星是 1937 年根据斯大林的批示安装上去的，多少年来，这 5 颗红星吸引了多少人的目光，“红星”照耀下的国度为多少人所倾慕。

1991 年 12 月 25 日 19 时 38 分，人们所熟悉的镰刀锤子的红旗从克里姆林宫绿色圆顶缓缓降下，人们似曾相识的俄罗斯联邦的白蓝红国旗徐徐升起，苏联第一任同时也是最后一任总统戈尔巴乔夫缓缓地和他的总统办公室走出来，在没有星星的夜空里，他抬起头来无限惆怅地看了克里姆林宫一眼，然而悄然地上车离开了。在另一边，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已经做好了进驻克里姆林宫的准备，克里姆林宫再度迎接它的新主人……

二、红色风暴汇集克宫

自从有了人类，也就有一系列的关系问题，有了一系列的纷争和纠葛。这个关系小可以涉及人与人之间的亲情、爱情、仇恨、怨嫉，大则涉及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往、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再者就是涉及到复杂的社会关系，诸如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富人与穷人的关系，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的关系等等。政治制度就是调整复杂的社会关系的一种方式，也就是通过这种制度来确立一个社会中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地位，划分不同的社会集团的权利范围。

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先后出现过原始军事民主制、专制君主制、

君主立宪制、议会民主制，它们基本上可划分为“民主的”和“非民主的”两大类。专制君主制度是在世界范围内的奴隶制、封建制国家中所盛行的一种政治制度，是君主独揽国家全部权力的一种政治组织形式。奴隶制社会的古埃及和巴比伦的暴君统治或神权政治是专制制度，古罗马的尼禄、凯撒、渥大维等人的统治是专制制度，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王朝的皇权统治也是专制制度。欧洲虽然可以称得上是民主制度的故乡，但是专制君主制度在这块大陆上也曾有过极其风光的日子。

苏联著名的学者阿夫托尔哈诺夫曾经说过：“不讲马基亚维里不能理解斯大林的罪恶，不讲尼采——就不能理解斯大林主义者的哲学。”

15 世纪意大利的专制主义理论大师尼可罗·马基亚维里认为：“历史上所有王国，不外乎以下两种方式之一来统治的。或者，由一个绝对的君主来统治，他把其他一切人当作奴仆，其中只有几个，获得了他的恩宠与同意，以大臣资格，帮助他处理王国里的政务；或者，由一个君王与贵族们共同统治，贵族们之所以保有这个等级，并非由于他们君王的恩宠，而由于他们的古老的家世。在君王及其臣仆统治的国家中，君王享有较大权威，因为在这个国家里除他以外，谁也不能视为高贵的。”

他继续开导君主们：“究竟一个为君主的人，让别人对他爱多于惧好呢，还是惧多于爱好些？问题的答案是：他应该既为人所爱，又为人所惧，但因二者难于兼得，所以如果二者必须缺一的话，那么与其为人所爱，总不如为人所惧更加安全。因为一般说来，人都是忘恩负义的，易变的，奸诈懦弱的，趋吉避凶的，贪得无厌的，当你施恩于他们之时，他们是完全属于你的，他们愿意为你流血，愿意献出他们的财富、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孩子。只当，一如我在前面说过的，此种献身的需要还是遥远的时候。但是，一旦时机临近，真要他们这样做时，他们却反叛了。此时，如果有一个君主，

从来只相信他们的诺言，不曾做其他准备，那他就完蛋了。”

他还说过：“人人知道，为君者能言而有信，其行为能完美正直，不事机巧，不耍手段，那是多么的值得称颂。虽然如此，我们的这时代的经验告诉我们：那几位干大事成大业的君主却对信字非常轻视，他们能以手腕乱人心智，且终于征服了那信守诺言的君王们。与人争雄，世间有两种方法：一种用法律，另一种凭暴力；第一种是人的方法，第二种是兽的方法；不过第一种方法会时常觉得不足的，必须借助于第二种。因此，为君的人一定要懂得如何善自利用兽，又善自利用人。既然君主不得不懂得如何行若野兽，那他就得效法狐狸与狮子。因为狮子难保它不落入陷阱，而狐狸则不能抵敌豺狼。因此，人必须是能识别陷阱的狐狸，又是能威慑豺狼的狮子。那些只想做狮子的人不明白这一点。因此，一个聪明的君王，遇到如果守信就要违反自己利益，遇到束缚他守信的理由已不再存在之时，他便应该不守信。假使人都是善的，那么这个箴言便站不住，但因人是恶的，他们不会对你守信，总不会找不到一个合理借口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举出数不清的例子来，它们表示出有多少个条约与诺言曾经因君王们的背信而成为无效：那些最能效法狐狸的人，得到了最大的胜利。不过人君的这个狐狸性格却必须获得如何善自掩饰。效法狐狸的必须是出色的装模作样者与出色的伪装者，而人们是如此地头脑简单，如此地易于为目前的需要所屈服，因此，谁若设法去骗人，他永远会找到自愿的受骗者。……我甚至还敢说，如果真的具备这些品德而永远遵行这些品德，对于人君说来是有害的。可是表面上装作具备这些品德，对于人君有益。要让人看来是仁慈的、忠实的、合乎人情的、虔诚的与正直的，甚至，事实上都可以真的如此。但他必须有这样的一种心理准备，即当局势要你不这样做时，你要会懂得如何反其道而行之。必须懂得：一位君主，特别是一位新君，为的要保持他的国家，时常被逼采取一些背信的、不仁慈的、不人道的以及反宗教的行动，所

以他不能奉行人之所以贵乎为人的种种事情。因此，他一定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可以随时看准风向，按照不同的命运的指示，去适应。同时又要像我在前面所说，如果可能，君王应不违善行，但为时势所逼时，他又是能够做坏事的。”

“君主的自由意志是不该完全抹煞的，所以我想，说命运是我们一半行为的主宰，但命运还留下另外一半，也许是较小的一半，让我们去支配。我将命运比之于那些泛滥的河川，当洪水来到之时，淹没了原野，冲走了树木和房舍，将土壤从一个地方运走，让它们沉积在另一个地方。这时候，任何东西在它面前逃走，一切都屈服在它的威力之下，人们不能有任何作为来抵挡它。不过，它的性质虽然如此狂暴，我们却不能因此便以为当天气回复正常之后，人不应开浚河道，修筑堤岸，以备洪水再发之时，让大水从人造的河道里流去，使它的威力不那么不受控制，不那么危险。命运也是这样的，在不曾准备好力量来抵抗它的地方，它就显示了威力。哪里没有筑起堤防控制它，它的暴力就冲向哪里。”

马基亚维里说：“命运易变，而人的本性难改，故当二者相符之时，人是行时走运的，一旦二者相违，人就倒霉了。据我个人之见，人与其谨慎，毋宁行险，因为命运是一个女人，如果你想制服她，你就得打她，虐待她。正如我们所见，她宁愿为行险激动者所制，却不愿为行事冷静者所役。因此，命运是永远女人般的，喜爱年青男人，因为后生小子比较的不瞻前顾后，比较的猛烈，并且有较大的勇气去指挥她。”

马基亚维里还曾经说过：“君王为人所鄙，乃由于他在人家的心目中，觉得是喜怒无常的、轻薄的、女性化的、懦怯的、优柔寡断。所有的这些，君主都应该规避，有似避开礁石的危险一样。他必须在他的行为中显示出伟大、勇敢、庄重与坚强，而当他裁决百姓们的私事之时，必须表示出他的判断是无可更易的，以此给自己建立起这样的名望，使人人不敢存有欺君或愚君之心。”

因此马基亚维里堪称是一切独裁者的“教师爷”，他的那本惊世骇俗的著作《君王论》堪称是举世无双的“政治教科书”。

从政治学角度分析，专制制度是一种权力结构向上的体制，权力逐级向上负责，最后集中到一个人的手中，这个人可以称之为“沙皇”、“皇帝”、“国王”、“女王”、“最高执政”、“第一执政”、“哈里发”、“独裁者”、“总督”等等。专制君主制度的特点是国家的最高权力完全属于君主个人，宫廷是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以至社会生活的中心，因为宫廷里的命令决定了全国上下、贫富贵贱、各色人等的命运、前途、思维。

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曾经给专制制度做了一个最好的注解，他断言：“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而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如果龙颜大悦，草民也可以平步青云、直逼爵禄，直至其家人也随之鸡犬升天。如果龙颜大怒，顷刻间显臣、名吏、贵族、将军也会被贬冷落，甚至人头落头，直至株连九族、遗患子孙，落得一个“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哀叹。因为君主的意志就是国家的法律，所有臣民必须绝对服从。老百姓的行为举止不可越国家法律的“雷池”一步，但君主发号施令、行为举止却不受国家法律的限制，他拥有最高的法律豁免权。这绝对是一种不平等、一种不民主，然而这个制度在人类历史还是存在了数千年。直至 21 世纪的今天，专制独裁在我们的地球上仍然像一个幽灵一样在随风飘荡。独裁，正是克里姆林宫六百多年来不散的幽灵。“莫诺马赫皇冠”和权杖是克里姆林宫最贵重的财产。俄国的最高统治者不称国王，也不称皇帝，而是称“沙皇”，而“Царь”本身的含意就是绝对的和至高无上的独裁者。

自公元 988 年，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通过与拜占庭皇帝的御妹安娜公主的联姻加入了希腊正教的基督教，并且号令全国臣民一律皈依基督。从此，弗拉基米尔就以正统的东罗马帝国的继承人自居。基辅罗斯大公便毫不谦让地将拜占庭帝国皇室的皇

冠——莫诺马赫皇冠和皇室的徽章——双头鹰接了过来，惟我所用。

从此，在尖顶的莫诺马赫皇冠与双头鹰的阴影之下，在俄罗斯的宫廷里上演了一幕幕血雨腥风的戏剧。从公元 10 世纪的弗拉基米尔大公统治时期开始，直至 18 世纪初彼得一世统治时期，俄罗斯国家的版图从西南罗斯偏安一隅的小渔村扩大成纵横欧亚的大帝国，俄罗斯国家统治者的帝祚也经历了从小小邦国的大公到博大帝国的皇帝（沙皇）的发展过程。随着国家版图的不断扩大，统治者的独裁权力也扩大到极至，最终，俄国沙皇变成了一言九鼎、神圣不可侵犯的专制君主。

瓦西里三世（执政 1503—1533 年）自称是“统治全俄罗斯领土的君主之君主”，他这样告诫他的臣民：“君主的意志便是上帝的意志，朕的权力超过天下一切的君主，做为上帝意志的代言人，我有权支配一切人的财产包括你们的生命。”

真正为自己戴上莫诺马赫皇冠，向欧洲公开宣称自己是“沙皇”的是伊凡四世。伊凡四世自称是“全俄罗斯君主，上帝加冕的神圣沙皇”。他在登基时郑重宣布：“君主的称号就意味着承认不受任何限制的沙皇政权。一切民众，包括大贵族在内都是朕的臣民……朕朝乃圣弗拉基米尔所创，朕生于皇家，长于朝中，掌握自家天下，并非窃自他人，罗斯君主自古以来皆亲临朝政，贵族大臣不得干预”。彼得一世统治时期最终完成了由等级代表君主制向绝对专制君主制的转变。他宣布：“沙皇是专制君主，关于他自己的一切事情，不向世上任何人负责，但作为基督教的国王，他有力量和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管理自己的国家和土地。”

彼得一世是让欧洲真正认识了俄罗斯的沙皇。他大力推行一系列旨在加强沙皇专制统治的改革，不仅把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权、军权、司法权集于一身，而且还自称是东正教的最高领袖，形成了俄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集权统治局面。他留给后世的名言是：

“沙皇是专制君主。关于他自己的一切事情，不向世上任何人负责，但作为基督教的国王，他有力量和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管理自己的国家和土地。”

叶卡特琳娜二世也曾宣布：“治理俄罗斯这样幅员广大的国家，只能用专制君主制度，舍此皆为下策。因为其他统治形式很难使皇命迅速付诸实践，更会为那些妄图使一个强大国家四分五裂的野心活动提供土壤。”

东正教会也如此这般地告诉自己的信徒们：“沙皇的面貌形体虽然与常人、与我们没有什么差异，但他的权力则与上帝等同。”

马克思评价说：“俄国沙皇把北方征服者的军事统治同拜占庭皇帝后裔的神权专制制度合为一体，从而同时成为他的臣民在地上的主人和在天上的庇护者。”

俄国绝对君主专制的特点是，国家的最高权力完全属于沙皇，克里姆林宫和冬宫不仅是沙皇及其亲属生活起居的场所，而且是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所在。沙皇的专制权力来自上帝或天神所授，因此不受人世间一切的法律、习惯的限制，自然也不受他自己颁布的法律的限制。

直至 20 世纪初，面对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大潮，俄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仍然表现了较强的生命力。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M·伯恩斯断言：“彼得发展起来的专制主义在 20 世纪以前，一直没有显示出什么削弱的迹象。”

卡尔·马克思曾经说过一句非常精辟的话：“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的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在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

集权，这个飘荡于克里姆林宫，游荡于俄国大地上的幽灵，并没有因为改朝换代而屏息，甚至连轰轰烈烈的革命也不能使他寿终正寝。

1917年10月25日是俄国历史的转折点，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当天夜里，列宁以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宣布：“临时政府已被推翻，国家政权已转到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机关，即领导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和卫戍部队的军事委员会手中。”他同时也非常自信地宣布：“无产阶级民主将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

然而，历史的发展总是不依人的意志和意愿为转移的，历史发展也时常与善良的人们开上一个玩笑。尽管列宁一再强调“无产阶级民主比资产阶级民主民主百万倍”，但事实上，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人民主权国家，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在一定程度上难以摆脱“集权幽灵”的左右。

苏维埃政权正是建立在具有300余年专制主义统治历史的、以中央集权制为国家行政管理体制的沙皇俄国的废墟之上的。尽管布尔什维克所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以十分激烈的方式推翻了沙皇专制制度的统治，但是历史实践表明，旧的统治体制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打碎”，然而旧的统治体制的残余和其意识化形式——历史文化传统却不是能够在短时期内“摧毁”的，因为历史文化传统具有继承性和滞后性的特点。

早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列宁就曾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他强调当时的苏维埃政权的国家机构是“从沙皇制度那里接收过来的，不过稍微涂了一点苏维埃色彩罢了”，“我们的国家机关，除了外交人民委员部，在很大程度上是旧事物的残余，极少有重大的改变。这些机关仅仅在表面上稍微粉饰了一下，而从其他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政权没能摆脱这个幽灵的作用，苏联的政治列车最终还是走上了不民